

「明代學術思想史」專號導言

呂妙芬*

近年拜大量史料重刊、圖書館與資料庫使用便利之賜，以及研究者對於研究議題更深入的思考，也更講究研究方法，明代學術思想史領域不時可見既宏觀又論述細緻的作品。今年《明代研究》的主編李卓穎教授特別規劃明代學術思想史專號，廣泛向學界徵稿，在嚴格審查後這一期將刊載四位青壯輩學者的作品，每一篇都精彩，也頗能反映近年明代學術思想史研究的動態。

何威萱〈宋元理學家從祀明代孔廟小考——兼論明代孔廟與理學道統的關係〉一文主要探討孔廟從祀的學術標準與政治的關係。對於這個議題，朱鴻林、黃進興兩位前輩的研究對後進有極大的啟發。朱鴻林先生早在 1980 年代即發表了 “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 和〈《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¹這兩篇論文對於王陽明從祀議案的爭論焦點，以及政治局勢的利弊影響等，都有深入分析。朱先生也指出謝廷傑於隆慶六年（1572）刊行《王文成公全書》與支持王陽明從祀的關係，此文提醒我們一本書的刊行可能有著深遠的政治盤算，因此編輯者對於書的內容有所揀擇是可以想像的。黃進興先生的《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是另一本對於孔廟從祀研究有深刻影響的專著，書中對於嘉靖九年（1530）孔廟的改制、明朝從祀標準的變化與學術思潮之間的關係、儒學道統與治統之間的張力等問題都有深入的討論。²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E-mail: miawfen@gate.sinica.edu.tw。

¹ H. L. Chu, “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 1(1988): 47-70. 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原載於楊聯陞、全漢昇、劉廣京主編，《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慶祝壽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頁 567-581；修訂版收入朱鴻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與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12-333。

²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1994）。

兩位先生的學術洞見啟發了往後許多關於明代孔廟祀典與從祀的個案研究，例如許齊雄研究薛瑄（1389-1464）從祀、何威萱研究程敏政（1446-1499）對於孔廟從祀的看法、洪國強研究楊時（1053-1135）從祀、吳靜芳研究嘉靖孔廟改制、田富美研究明代罷祀荀子的過程，以及楊正顯研究王陽明《年譜》編纂及其從祀孔廟的關係。³這些個案研究都仔細討論了從議案的倡議、辯論與決議的過程，相關官員的態度，中央到地方的動員與人際關係，以及如何包裝呈現被提議者的「真儒」形象等。孔廟從祀在中國象徵著儒學最高的榮譽，是官方表彰真儒與正統的標準，其高度政治化的操作則是近年研究的焦點之一。

何威萱〈宋元理學家從祀明代孔廟小考〉一文從問題意識到研究方法都反映近年孔廟從祀研究的核心關懷。本文主要的問題意識是：朱子學在明代已是官方正統學問，與朱子有關的理學家們多成功入祀孔廟，明代孔廟出現了理學化的現象。那麼，朱子所建構的道統觀是否成為主導明代孔廟從祀的重要因素？何威萱針對明代提議從祀宋、元理學家的個案，考察每個個案的辯論過程，分析從祀的標準與理據，以探究理學道統與明代孔廟從祀的關係。全文逐一討論明代從祀吳澄（1249-1333）、胡安國（1074-1138）、蔡沈（1167-1230）、真德秀（1178-1235）、楊時、陸九淵（1139-1192）、羅從彥（1072-1135）、李侗（1093-1163）的個案，也檢視劉因（1249-1293）、何基（1188-1268）從祀案失敗的原因。根據這些個案研究的心得，何威萱認為理學道統並非明代孔廟從祀的關鍵因素。至少在明代中葉以前，「著書立言、輔翼六經之功」才是重要的標準，直到程敏政於明代中期力倡「明道之儒」的新標準後才有改變。作者也留意治

³ 許齊雄，〈我朝真儒的定義：薛瑄從祀孔廟始末與明代思想史的幾個側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7（2007），頁 93-114；吳靜芳，〈明嘉靖朝孔廟祀典改制考析〉，《成大歷史學報》，31（2006），頁 114-150；洪國強，〈宋儒楊時在明代從祀孔廟的歷程及其時代意義〉，《新史學》，25：1（2014），頁 51-95；何威萱，〈從「傳經」到「明道」——程敏政與明代前期孔廟從祀標準的轉變〉，《臺大歷史學報》，56（2015），頁 35-86；何威萱，〈明中葉孔廟祀典嬗變的理論基礎：程敏政的〈奏考正祀典〉及與張璁孔廟改制觀的異同〉，《清華學報》，47：1（2017），頁 45-84；田富美，〈明代孔廟罷祀荀子之歷程及其意義〉，《淡江中文學報》，37（2017），頁 1-27；楊正顯，〈王陽明《年譜》與從祀孔廟之研究〉，《漢學研究》，29：1（2011），頁 153-187。

統與道統之間的張力，指出皇帝與朝廷官員對於道統侵逼治統抱持警惕心理，官方的立場未必時時以道統為主要考量。

楊正顯〈後死有責：從《陽明先生文錄》到《王文成公全書》的師教衍變〉主要欲說明：為支持王陽明從祀孔廟，隆慶六年刊行的《王文成公全書》內容包括《傳習錄》、《陽明先生文錄》、《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年譜》、《世德紀》，其中不少是經錢德洪（1496-1574）之手編定的，《王文成公全書》並非王陽明著作的全貌。楊正顯近年輯佚王陽明詩文，⁴成績斐然，他自然清楚《王文成公全書》未能包含王陽明全部的作品，不過本文的目的除了說明王陽明文集的編定有曲折的過程，更欲說明錢德洪的編輯其實深刻受到當時政治與學術論爭所影響，錢氏的學術性格不僅影響王陽明全書的樣貌，也影響了後人對王陽明思想的理解。

本文從嘉靖年間編輯出版的《陽明先生文錄》論起，作者整理出三個版本系統，分別為：廣德本（嘉靖六年，1527）及其續編本；黃綰（1480-1554）序刊本（嘉靖十二年，1533）及其增刻本；姑蘇本（嘉靖十五年，1536）。廣德本現已亡佚，不過從文獻可知嘉靖六年編纂時只收錄王陽明「近稿」（約正德六年至嘉靖六年間的著作，1511-1527）的三分之一。黃綰序刊本收錄的文章較多，楊正顯認為可能是欲恢復「近稿」未刪前的原貌。姑蘇本的編輯既反映校訂者錢德洪和黃省曾（1496-1546）不同於黃綰的編輯理念，也受到朝廷政爭的影響而刪去部分文字。本文第二節討論錢德洪編王陽明《年譜》時抄錄〈大學古本序〉時卻不錄末句「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楊正顯認為此與當時王學門人針對何謂良知教的爭議有關。接著，討論〈大學問〉（《大學或問》）著作的年代，探究何以錢德洪直到隆慶六年才將此文收入《陽明先生文錄續編》。楊正顯主要以「嘉靖朝政治情勢不利於陽明學、隆慶朝才有所轉變」進行解釋。本文最後則集中討論《王文成公全書》的形成，以及錢德洪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⁴ 楊正顯，〈王陽明佚詩文輯釋與補正〉，《古今論衡》，20（2009），頁 95-132；〈王陽明詩文輯佚與考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1（2010），頁 93-125；〈王陽明詩文拾遺〉，《古今論衡》，22（2011），頁 139-174；〈王陽明佚詩文輯釋——附徐愛、錢德洪詩文集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1：4（2011），頁 157-189。

這篇文章告訴讀者一部權威的《王文成公全書》並不能忠實呈現王陽明思想的全貌，此書的編成與其他許多文本一樣，都受到所處時代的人物、政治、學術論爭等複雜因素所影響，我們若想要更深刻地理解王陽明思想，也必須同時留意過去型塑其思想呈現樣貌的不同因素。嚴格說來，我們很難百分之百確定錢德洪每一個刪削或揀擇史料動作背後的真正考量或原因，雖然楊正顯的推敲絕對值得參考。作者強調明代政治與學術爭議深刻影響了《王文成公全書》這本帶有支持王陽明從祀孔廟之政治意圖的書，則是沒有疑義的。

吳孟謙〈晚明虞山書院的生死輪迴之辨——兼論耿橘、張鼐的思想立場〉主要研究張鼐（1572-1630）編纂的《虞山書院志》第十四卷所錄書院講學者對於生死輪迴的討論。晚明士人關懷生死的議題，學者雖早有留意，但研究成果仍然不多。生死問題是生命與宗教的核心關懷，儒釋道三教各有觀點，晚明三教士人更是熱衷討論。天主教入華後立即加入論辯，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南京與北京和許多士人與佛教人士對話，部分內容可見於《天主實義》（1603年出版）。⁵利瑪竇不僅提供天主教關於個體靈魂不朽、生死非氣之聚散、人死後有知、反對輪迴、相信天堂地獄等一系列新的觀念，也激烈批評佛教的六道輪迴、殺生、齋戒、天堂地獄觀，引發杭州佛教人士的大力反駁。據吳莉葦研究，從1608年虞淳熙（1553-1621）撰文反駁利瑪竇，到1615年祿宏（1535-1615）的正式反駁，再到1630年代更多以佛教士人為主的「破邪」論述的出版，代表著杭州天主教勢力的擴大，及其與佛教矛盾之加深。⁶《天主實義》中也涉及對於宋明理學生死觀的批評。

《虞山書院志》十四卷中所記載的是在1606年、1607年兩次書院講會中，士人圍繞著生死、鬼神、輪迴、聞道者死後是否斷滅等問題展開的討論。虞山書院的討論起因於管志道（1536-1608）到書院主講，言及前世後身、死生

⁵ 利瑪竇（Matteo Ricci）著，梅謙立（Thierry Meynard）注，《天主實義今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頁28-29；吳莉葦，〈晚明杭州佛教界與天主教的互動——以雲棲祿宏及其弟子為例〉，《中華文史論叢》，113（2014），頁325-357。

⁶ 吳莉葦，〈晚明杭州佛教界與天主教的互動——以雲棲祿宏及其弟子為例〉，頁325-357。

輪迴而引發邵濂叩問「生死輪迴」等問題，除了耿橘（1601 進士）、張鼐的回應外，發言者多達二十人，所討論的議題包括：何謂生死之道？是否有「神理綿綿與天地同久，不隨生存不隨死亡者」存在？若是，此神理何所附麗？人死後的光景作何狀？死後是否有知？是否須多生修習方能證悟本體？如何能即生以知死？這些問題不僅與儒、釋、道三教有關，也與天主教與儒、釋之辨有關。

吳孟謙查考所有發言者的身分，分析他們的發言，有接近程朱理學、陽明心學、禪學、儒釋會通等不同的立場；他也指出耿橘和張鼐均有融會心學與禪學的思想傾向。本文最後則以王畿（1498-1583）、聶豹（1487-1563）、羅汝芳（1515-1588）、葛寅亮（1570-1646）等人在不同場合中論及生死輪迴的例子，說明本文所論虞山書院中的講論實有更廣泛的學風背景。《虞山書院志》紀錄的講學內容非常豐富，反映了晚明江南士人對於生死的強烈關懷與好奇，也具有濃厚的三教背景，未來值得更多的研究。

劉勇的文章主要說明一幀湛若水（1466-1560）〈格物之說〉手蹟的文獻價值。他從正確釋文這幀書法手蹟開始，指出題識文字最末「右與世傑格物之說，書付君恪。甘泉。」提供了重要的線索。這幀書法作品是湛若水送予君恪的，君恪是鄧睭之字；現存湛若水文集尚有其他文字說明湛若水與鄧睭兩人的交往。書法的內容是〈格物之說〉，本是湛若水贈予世傑的詩，世傑是陳洸（1478-1534）的別字。劉勇主要根據湛若水與王陽明關於《大學》版本與「格物」之解釋的論學資料，來判斷湛若水〈格物之說〉最初寫作的情境。他認為此詩約作於正德十六年（1521），當時湛若水欲託將進京會試的陳洸攜帶《大學測》與《中庸測》二書送給王陽明，陳洸在赴考之前專程到西樵與湛若水見面，〈格物之說〉應即創作於此時。接著，劉勇根據湛若水〈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答楊少默〉、〈寄陽明〉、〈答仲鵬〉等文，說明陳洸於湛若水和王陽明之間扮演著傳遞與轉述的角色。〈格物之說〉除了這幀手蹟外，現亦存於四種湛若水的文集中，以及由湛氏門人所纂修的《增城縣志》。本文也針對這些現存的明代文本，逐一說明其生產的時間與潛在的受眾。劉勇認為〈格物之說〉的文獻價值在於它的創作時間介於《大學測》（已亡佚）與〈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之間，此詩雖是贈予陳洸，實以王陽明為潛在對話者，故能增加

我們對於湛、王二人論學的理解。

以上四篇文章無論就議題的設定、研究的方法或論述的深度，都是明代思想史的上乘之作，也都反映了這個領域在過去幾十年間的積累成績。我相信這些著作的出版能啟發更多新的研究，也希望能吸引更多人跨足這個精彩的研究領域。